

再分配体制的再生

——杰村的制度变迁

冯仕政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再分配体制的再生

杰村的制度变迁

冯仕政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冯仕政著.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

ISBN 7-80140-251-0

I. 再… II. 冯… III. ①农村—社会变迁—研究—河南省

②农村经济—经济制度—变迁——研究—河南省

IV. ①C912.82②F32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725 号

书 名	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
作 者	冯仕政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矿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25
字 数	232 千字
书 号	ISBN 7-80140-251-0/C·3
定 价	22.00 元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心 2000 年度研究项目“当
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实证
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序

郑杭生

1999年，教育部为了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即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设立100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严格的评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入选，成为全国两个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根据教育部的规定，重点研究基地是开放的，课题实行全国招标。以我为项目负责人的课题——“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过专家评审立项，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2000年度课题。冯仕政博士的这本专著《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即是该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该书的基础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做了修改并出版。该书运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不仅通过杰村这个案例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而且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化了关于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以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标志，中国即进入一个社会转型加速期，迄今已历20余年。正如大家所耳闻目睹的，20多年的加速社会转型引发了大规模的、急速的制度变迁。厘清这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既是社会运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改革

进程中的制度变迁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都十分关注的课题，尤其是经济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所进行的研究，在经济学内外、在学术界内外都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社会学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魏昂德（Andrew Alder）、白威廉（William Parish）、倪志伟（Victor Nee）、林南（Nan Lin）、戴慕珍（J.C.Oi）等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斐然，在西方很有声势。在国内，众所周知，1949年后，中国社会学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直到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才得以恢复重建，20多年来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比较稚嫩。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学仍然迅速投身于中国改革的洪流中，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制度变迁问题自然也不会被排斥在社会学视野之外。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研究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社会转型视角，即强调从整个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或行政管理体制的转轨过程。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社会学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研究不仅成果是突出的，而且特色是鲜明的，比如关于“单位制”、“户籍制”、“官本位制”（或曰“行政制”）等制度形态的研究，受到党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有些已经被采纳入国家政策，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以往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冯仕政博士的《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一书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首先，本书的选题很好，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学术研究中，提出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分析问题的重要性。

“问题”本身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项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杰村再分配体制再生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是很有水平、很有价值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这个题材来看，如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如何推陈出新是一个大问题。作者所采取的策略是，选取一个村庄进行案例分析，寓大于小，以小见大。这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学中很寻常，但如果放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这个题材的研究背景下来看就显得很有意义了。以往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研究，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理论研究多，经验研究少；共时性研究多，历时性研究少，并且很多研究都是单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推演，看起来气势宏大，其实则空洞疏陋。事实上，中国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非常复杂和精微，是几个简单的范畴和命题所难以概括的，要搞清楚其逻辑和机制非有扎实、深入的经验研究不可。本书坚持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方法，立足于杰村 20 年的制度变迁过程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是相当有理论价值的。

二是从“杰村”这个题材来看，本书的选题也很不错。本书的经验研究对象——杰村不是一个一般的村庄，“不一般”的表现之一，是前人关于它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而作者能够独辟蹊径，从“制度变迁”这个角度来考察“杰村经验”，其独创性是很值得赞赏的。

三是从现实意义来看，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之初推行“大包干”之后，再没有有意识地进行过新的整体性的制度创新。而事实证明，制度创新已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杰村作为农村社区发展的先进典型，其经验不管实质为

何, 不管普遍性如何, 探索其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对于中国“三农”体制创新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第二, 本书有不少理论发现和理论创新。

这首先表现在分析框架上。本书虽然只是一个个案分析, 但作者并未限于简单的现象描述和材料堆积, 而是着力提升理论层次, 着力建构理论命题。作者将理性选择视角、嵌入性视角、社会转型视角等三个理论视角有机的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作者认为, 当前非常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 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范式, 即认为“理性人”的竞争与合作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机制。该范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即对“理性选择”做了非社会性 (unsocial) 的解释, 亦即把人的“理性”视为一个与生俱来的、独立于社会情境之外的常量 (constant), 而不是一个受社会环境建构的, 因而会随社会情势而变动的“变量” (variable)。为了克服这一缺陷, 必须将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与实时的社会情境结合起来考察。为此, 作者引入了格拉诺维特 (M. Granovetter) 的“嵌入性”理论。为了便于进行操作化的实证研究, 作者又进一步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嵌入性关系区分为“文化嵌入”和“资源嵌入”, 前者用以刻画行动者的目标选择和价值取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后者用以刻画行动者的行动条件和手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了把握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动, 作者又引入了我的社会转型理论, 指出中国自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过程, 而是一场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后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过程, 市场化只是社会转型在特定历史时段的要求和表现, 它在新时期既是社会转型的推动力

量，又是为社会转型服务的。上述制度分析框架尽管还是比较粗线条的，仍有若干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总的来说是很有创新意义的，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表现在对杰村制度变迁过程的具体分析上。作者指出，杰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以村党委书记为核心的村庄领导集团按照自己确定的“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对村庄进行社会重组的过程。因此，对杰村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行动者的形成（第三章“社区政治”）；二、制度选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第四章“社区规划”）；三、制度实施的条件、手段（第五章“经济发展”）和过程（第六章“社会重组”）。在每一个分析环节，作者都深入分析了杰村的制度变迁与整个社会结构转型（第二章）之间的嵌入性关系，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见解。比如，作者认为，杰村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社会结构与该领导人个人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权威类型是兼有“父爱”和“专制”两种性质的“教化权威”，他之所以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仍然致力于社区的发展，与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文化及其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共产主义小社区”这样一种村庄定位的形成与上级有关部门的诱导、支持密切相关，是村庄与国家互动的结果；国家一典型之间的庇护主义关系和社区“见习劳动力”市场是杰村最重要的效率机制，而它们又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村庄的社会重组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当前小农经济所面临的转型困境不无关系。本书最后的结论是，杰村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是杰村领导集团在社会转型的结构情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该理性选择不管是在文化上还是在资源上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在此过程中，村党委书记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他是联系历史与

现实、村庄与国家、市场与再分配的一个枢纽；杰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与有关部门之间的庇护主义关系，因此是很难推广的。这些观点和结论，逻辑清晰，论证充分，既来源于经验分析，又高于经验分析，是很有理论深度的，不但细腻地展现了杰村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也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三，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很值得提倡。

本书的经验研究对象——杰村是一个头上戴着多重光环的“典型”。这样一种特殊情况，使作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面临很多难题——事实上，作者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作者仍然克服重重困难进行深入调查，所以，现在我們才能在本书中看到如此丰富的经验材料。对于杰村，外界有两种截然相反、尖锐对立的评价，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冷静客观，褒贬臧否俱以事实为依据，不溢美，不匿过，有理、有据、有节，更是难能可贵。

最后，作者平实、流畅的文笔也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

从上述不完全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该书确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冯仕政博士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与他多年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1995—1998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1998—2001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都见证了他的勤奋、刻苦、踏实。在此期间，他即已显示出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一定的研究方法技巧，以及英语和电脑方面的较好掌握，显示出他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

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的双重指导教师，最感欣慰的是，现在树苗已经长大成树，他的努力也开始得到肯定。本书的前身，亦即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在2002年度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

论文评选中，当选为全校 20 篇优秀博士论文之一。

特别要指出的是，冯仕政博士的专著《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也在某些方面深化了我提出的几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自 1983 年底从英国回来后，我一直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社会学元理论等方面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或者更广泛地说，社会理论。这些理论作为一种视角，作为一种范式，比如，社会运行的视角或范式、社会转型的视角或范式等，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研究中帮助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分析问题的逻辑线索。而作为一种理论，这些理论则须在两方面深化，一是理论本身的深入、完善，二是向有关具体领域的深入、扩展。我非常高兴的是，除了我本人，以我为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的其他成员，也在这些不同的方面下功夫。在这个学术群体中，博士生和我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重要方面。迄今为止，我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经用上述一个或几个视角，深入、扩展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例如：犯罪和法社会学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留学）领域、环境问题领域、制度变迁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社会分层领域、教育领域、女性问题领域、民族关系领域、社区领域、社会学中国化领域、伦理问题领域、邪教问题领域、社会与个人关系领域等。其中，洪大用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 2001 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殊荣，在社会学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所有这些，包括冯仕政博士的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着上述理论，也都在为社会运行学派的形成添砖加瓦。没有比一个学术传统后继有人更重要的事了。

学无止境。任何已有的成果——那怕它是多么成功，都是新的探索的起点。我们没有一条理由，可以停顿下来，躺在已有的

成果上孤芳自赏、沾沾自喜；却有一千条理由要求加倍努力，沿着崎岖不平的学术之路，埋头苦干，继续前进。何况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中国社会学仍然处在弱势社会学的地位。我们和中国社会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都负有改变这种弱势地位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一定要坚持走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一方面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又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公认的国际性，才能真正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在某种程度上说，冯仕政博士的专著《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也是把本土化和国际化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而且是比较成功的尝试。但是今后我们要走的把本土化和国际化结合起来的学术之路，还很长很长。我相信，冯仕政博士有这样好的起点，今后会在这条康庄而又艰辛的学术之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2002年10月22日

目 录

序	郑杭生
导 言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杰村研究综述	(4)
三 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	(16)
四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26)
五 本书的结构安排	(42)
六 调查与资料	(44)
第一章 杰村概况	(48)
第二章 社会结构转型	(51)
第一节 文化结构转型	(51)
第二节 资源结构转型(上): 农村改革	(66)
第三节 资源结构转型(下): 庇护主义关系的存续	(80)
第三章 社区政治	(94)
第一节 政治体制	(94)
第二节 政治权威	(106)
第三节 政治行为	(118)
第四章 发展规划	(130)
第一节 规划的内容	(130)
第二节 规划的实质	(149)

第三节 规划的形成	(153)
第五章 经济发展	(169)
第一节 发展模式	(169)
第二节 历程与成就	(176)
第三节 效率机制	(187)
第六章 社会重组	(209)
第一节 再集体化的过程	(209)
第二节 再集体化的社会基础	(219)
第七章 再分配体制	(230)
第一节 制度安排	(230)
第二节 社会控制	(248)
第三节 社会生活	(259)
结 论.....	(271)
一 主要内容和基本结论	(271)
二 杰村经验与理论传统	(277)
三 杰村经验的政策含义	(279)
附 录 调查问卷	(281)
主要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308)

问题与分析框架

一 问题的提出

在河南南部某地，有一个行政村，人称“共产主义小社区”。本书根据社会学的惯例，姑且隐去它的真名，唤之为“杰村”。说起杰村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那可真算得上一段传奇：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也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穷而且乱，而今，却已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不过，与关于杰村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本研究关注的焦点不是这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政治意义，而是其自改革以来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本书就是一项以其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为经验题材的个案研究。

杰村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重建再分配体制。1980年前后，我国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杰村也于1981年按照中央政策解散了集体，分田到户，重新回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状态。然而，不久——确切地说，是在1984年，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杰村又重新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我国农村，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而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新成立的“集体”，绝大多数与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

“集体”有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这些“集体”虽然在形式上还是原来的村落共同体，但其内部组织法则却已发生质的变化，即，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按原来的再分配原则组织起来，而是按新的市场原则组织起来。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与其说是“集体”，不如说是一种以地缘关系为组织基础的“公司”。因此之故，有学者将这些按照市场法则重新组织起来的村落共同体称为“新集体”，而这种在村落共同体基础上实施的市场原则则被称为“新集体主义”。^①杰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集体经济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对外交往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法则，但其村落共同体却是按照再分配原则组织起来的。因此，其集体经济越是发展，集体内部的再分配程度就越高，市场原则的领地也就越小。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在杰村，村庄领导集团不但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而且掌握了绝大部分生活资料，村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一个领导集团来“再分配”的。

问题就在这里提出来了：杰村重建再分配体制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更具体地说：第一，在举国上下都在推行市场化改革，并且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的条件下，杰村为什么会重建再分配体制？又如何可能？第二，到底是哪些因素对杰村重建再分配体制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作用？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这里有必要对上面提到的“市场一再分配”这样一种两分法做一个补充说明。1957年，美国著名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其《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将人类的经济交换方式区分为三种类型：市场、互惠和再

^① 参见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

分配。波拉尼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具有横向联系，其主要的联系中介是价格和货币。再分配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中央”指挥之下的纵向网络，产品和剩余自下而上交给“中央”，再由“中央”沿着纵向的权力关系网络自上而下进行“再分配”。互惠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虽然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直接见面，这一点与市场经济相同，但联系的中介却不是价格和货币，而是信任和礼物。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泽林尼（Ivan Szelenyi）在一篇研究东欧国家社会分层的文章中首次将社会主义经济称为“再分配经济”。^①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②）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他在1989年提出的“市场过渡理论”（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③）中，明确将社会主义改革视为一个从再分配向市场过渡的过程。“市场过渡理论”在整个学界引起很大轰动。伴随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市场一再分配”这样一种两分法也从此成为社会主义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观念。本书也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再分配”和“市场”这两个概念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书仅用这两个概念来指称某种制度形式，并不包含“市场”一定优于“再分配”的价值判断。

① 参见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一译为“维克多·尼”或“维克多·倪”。西方许多中国研究学者都有自己的汉文名字。为了表示尊重，本书在行文时尽可能地恢复之。但在引文时，则尊重译者原文。这样难免在正文和引文之间出现一些差异，望读者明鉴。

③ 最初一般译为“市场转型理论”，现在一般译为“市场过渡理论”。笔者认为，“市场过渡理论”的译法更为准确，此处从之。不过在引文时，为尊重译者，保留其原译法。